

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

王 爾 敏

- 一、引言
- 二、湘系核心領袖及其創軍初志
- 三、中層領袖分子
- 四、締造經歷與發展關鍵
- 五、結論

一、引 言

道光末年，太平軍起事，迅速發展，不數年間，自廣西邊隅，達於長江心臟，據江寧為天京，形成與清廷對峙之王朝。此時兩廣兩湖及蘇、浙、皖、贛同被兵刦，起而與太平軍抵抗者，官兵之外，即為各地紳士。各省紳士遭遇相同環境，而在此環境中奮鬥以出，獨創一種軍制風格及重要之軍系集團者，則只有湘軍。

湘軍之發展與其軍系之形成，原非其領袖所能預期，就清代軍制沿習傳統而觀，殆亦可謂憑空創一格局。時勢環境固然重要，而其領袖人物之志趣、節操、胸懷、眼光以至創制才能，則更為重要。此處自非演述湘軍史實，乃至制度規模等正面問題，但就有限篇章，以探討湘軍領袖羣之苦心經營，艱難締造，而終於達到成功之境，則足以見出一軍系之發展存續之若干關係脈絡，進而用以了解晚清政局中軍系之特色。

湘軍自創始以至發展壯大，並非一帆風順，可謂屢仆屢起，歷經無數艱苦奮鬥。後人徒見曾國藩之勳業彪炳，湘軍領袖之荐致高位，然其得來實非容易，其經歷之崎嶇坎坷，險惡風波，亦非常人所能想像。故此一代軍系之形成，實饒具多重興味與意義，值得作深入發掘與探討。一以認識堅毅奮鬥之意義；一以見出時勢機緣之意義；一以見出高尚志節之意義；一以見出同心協力團結奮鬥之意義。

探討湘軍軍系，必須釐清幾項重點，以提供一般參考。以下範圍為本文所當研討澄清以作相當正確成分之解釋者：其一，湘軍系之共同領袖及其所具備之條件。其二，湘軍領袖之創軍初志，同心願。其三，湘軍系領袖間之固結糾紛與衝突。其四，湘軍系之奮鬥精神。其五，湘軍系之發展時機及其領袖之共同策劃。其六，湘軍系擴張之政策及手段。其七，湘軍系發展中之異籍分子。以上皆就湘軍系本身略作探討，實則更可擴大至國家政治活動中種種參與與運用。由於要牽涉更多複雜之政治關係與重要人物，問題更加複雜，故而不能在本文中一併討論。

湘軍系之發展存立與其成功，不盡在於敢戰之軍伍與驍勇之將校，其特別當為首要者，則在領袖將帥之政治修養與堅毅志節。因是討論湘軍領袖羣，當別為三項層次而觀，其下層者則統兵將帥之能者，其謀足以料敵，勇足以制勝，若劉鴻、塔齊布、張運蘭、江忠義、李輔朝、蕭啟江、多隆阿、鮑超、劉松山等是。中層者則有統兵之才能，有戰略之方針，足以統籌全局，總制一方者，若羅澤南、王珍、李續賓、李續宜、楊岳斌、彭玉麟、曾國荃、劉長佑、劉坤一、劉蓉等是。上層者則持有基本政治理想，一定之建軍策略，並對當時國家情勢具整體之了解者，則只有曾國藩、江忠源、胡林翼、左宗棠四人。此四人者實為湘系領袖團結之核心，湘系集團之重要支柱。而曾國藩則又為始終貫串其間之精神領袖。

二、湘系核心領袖及其創軍初志

湘軍領袖間之團結基礎，最重要者在於其共同志趣，和對時政時勢一致之認識。其較為高遠之正大宗旨，自是衛道救世。若曾國藩、胡林翼、郭嵩燾、劉蓉、左宗棠、羅澤南、王珍等人，均屢屢言之不煩。但此空洞目標，實少約束性，衆人又實際難做到與聖賢等齊。惟其功用，則足以使彼等始終維繫一高遠志節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彼此則互相提示督勸，以振刷奮鬥精神。至較為切近之時政時弊，因其領袖羣均有痛苦感受，使之產生一種不平之蘊蓄和改革之動念。滿懷憤勵之氣，和強烈開創精神，盡其力所能及，共同奔向一條自闢之道路。此種認識感受，抱負毅力，均以曾國藩表達最深。曾氏在咸豐三年創軍之初，曾數次提到。如致書黃子春云：

「國藩從官有年，飽閱京洛風塵。達官貴人，優容養望，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，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。積不能平，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，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，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

氣之偏，以是屢蹈愆尤，叢譏取戾。而仁人君子，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，且當憐其有所激而擣之之苦衷也。①

國藩自練湘軍以及創立水師，雖是軍事一格，亦全在針對軍伍積弊，一切從頭做起，自定規制，自營組織，並特以此為建軍宗旨。而所援引共事之同志，大多富有理想，操守清介。諸領袖間容或意見不同，而此種純正之學養，任事之勇毅，治軍之勤奮，俱為其相結合之共同條件，彼此互相欣賞信賴，並標榜其嚴正之風格。諸領袖間時常談論之志氣問題，正為湘軍一系一貫之崇高信仰。

當湘軍草創之初，其代表鄉紳，領導衆庶之中心人物，則以江忠源與曾國藩聲望最高。國藩以在籍京官地位，資歷俱備。忠源則在咸豐二年間，僅以知縣身份率楚勇屢敗太平軍，尤以蓑衣渡一役，使之聲名與日俱增，知兵任戰之譽，為湘省之冠。且亦奠定湘勇作戰之信心。只此起始，即已非他省鄉紳所能企及。蓋全省官紳仰望，以為有此領袖足以信賴，自己清楚形成全局重心。②

江忠源聲望日起，湘軍出處有寄託之人，推見諸領袖之仰重信賴，均於忠源寄以重大期望。胡林翼早在咸豐二年夏間向湖南巡撫張亮基推薦。「江岷樵昔年在京鄉試，負其死友之櫬而歸。二次行邯鄲道上，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櫬。此其行誼，即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。昨已函致岷樵，彼風節優於天下，當有感奮不能自己之誠。」③ 左宗棠亦在咸豐二三年間屢稱忠源為當世人傑。④ 曾國藩以長者地位對之護持期許甚深。如咸豐三年致忠源信云：

「足下之信義，為吾黨所俯首，而資地尚淺，威望未為大著，挈不願遠出之楚勇，附之以孱怯思潰不知誰何之兵，入素未經歷之地，日周旋乎水火鬪爭之諸將，以當虎狼百萬之賊，雖殫竭心力，固亦不能自神。若留湖北養威期年，訓練強兵，申理冤滯，民望既歸。萬一賊匪泝江回撲，殆可與之一戰。賊即不反而西，以足下之勇智，但使練兵數月，亦可出而破寇。故鄙人願左右之稍得休息，以暗圖汾陽西平之烈也。國藩在此亦日以練兵為要，塔（塔齊布）都司差可與謀事。此外殆罕宏濟之侶。羅（澤南）、郭（嵩燭）、二劉（劉蓉、劉鴻鴻）數書生，忠勇有略，茲壯吾魄耳。令弟既北，印渠（劉長佑）與相堂必宜

①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書札，卷四，頁四十五。

② 江忠源自咸豐元年以丁憂知縣，隨烏蘭泰軍入廣西。咸豐二年初，烏氏陣亡，忠源返鄉募勇，再入廣西。四月而有蓑衣渡之役，太平軍南王馮雲山中礮死。自是忠源再入湖南，迭獲勝仗。聲名雀躍，迄咸豐三年十二月殉難安徽廬州，已自知縣歷升至安徽巡撫，可以說聲望動名，一日千里。

③ 胡林翼：胡文忠公遺集，卷五十五，第五頁。

④ 左宗棠：左文襄公書牘，卷二，頁十，與陶少雲書：「江岷樵奉旨以湖北臬司幫辦軍務，此君與僕至好，在當今允推第一流，若早使此君辦賊，何至猖獗至此，惜已遲也。」

留南，印渠大可倚，淳實而有深謀，時輩那得見此。」^⑤而國藩在鄉訓練湘勇，大力經營，自始即計劃交與江忠源統帶，推江氏爲公衆之領袖。國藩則自任經理後路之一切準備，爲江忠源配合應援之輔佐。此項計劃，曾告之左宗棠，並亦徵辟宗棠爲助手：

「岷樵（江忠源）超擢皖撫，是近日中一大快事。惟廬州新立之省，無兵無餉。江南江北各郡，皆逆舟往來必經之地，此防彼竄，疲於奔命。且素日貫用之楚勇，又潰去十分之七，而骨肉至交如閣下與筠仙（郭嵩燾）者，又皆遠莫之助。以單獨之身，處積疲之區，吾不知岷老將從何下手也。弟欲練二三千人，遠致皖中，爲岷老一臂之助，默數平生之交舊，環顧天下之賢豪，惟此君尚有討賊之志，又勳名日著，亦漸爲人所信仰。若代爲練一勁旅，添其羽翼，則澄清之望庶幾可期，惟弟智慮短淺，獨力難措，欲乞左右野服黃冠，翩然過我，專講練勇一事，此外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。」^⑥

及江忠源不幸於廬州殉難，國藩震驚之中尤感失所依傍。蓋其自度才力，並非統帥之材，忠源歿後，又不得不支撐，於是表現相當焦灼。其與湖南巡撫駱秉章信中，對其計劃與處境申說甚明：

「侍十三夜接寄諭，知岷樵殉難，心緒萬分作惡。侍所以辦理一切，規模宜大，條理宜明者，意將交付此人，以渠爲大帥，而以侍參酌其間，或有小補耳。今斯人旣亡，侍之精神、才力、度量、閱歷四者，皆不可以爲大帥，而浪得虛名。京師之人，以耳爲目，動輒保奏侍出辦軍事，此事不知作何了局也。」^⑦

初時江忠源名位資歷，俱在國藩之下，而其聲譽正起。國藩雖以長者身分敦勉教導，其於軍事則自居輔佐，足見初起之時乃爲理想抱負之實踐，從無念及權位名分之意，此亦湘系結合之一項重要條件。

至於曾國藩旣素敦學行，本身又爲京曹大僚，學養志趣，資歷威望，均爲湘紳之冠，羣士衆向歸趣，自具領袖資格。其出山雖爲朝命所催，亦迫於鄉紳督勸，蓋其勵望如此，不能不出而爲保鄉衛民之舉。鄉紳之矯矯者，則共相擁戴而追從之。

國藩最初出辦團練，朝命方到家二日，郭嵩燾即親來催駕。^⑧嗣後郭氏即爲國

⑤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書札，卷二，頁一八一一九。

⑥ 同前書，卷三，頁三八。

⑦ 同前書，卷五，頁十一。

又，同書，同卷，頁十四，與吳文鎔：「國藩之初意，欲多備船隻礮械，募練勁旅，奉吾師爲主帥，而國藩與岷樵二人爲左右之輔。蓋以近年以來，老成凋謝，吾師爲中原羣士所歸仰，而國藩與岷樵二人又皆出門下，或者共相激勵，維持南服數省之大局，今岷樵成名以去，吾師又被參劾，國藩區區，將何所依倚以圖宏濟乎。」

⑧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家書，卷三，第二十四頁。

江忠源歿後，另一重要領袖亦漸嶄露頭角，得與曾國藩長期應援，相得益彰，此即胡林翼。林翼出身富貴公子，又早中翰林，在國藩之先，資望原有憑藉。只是未為京曹近貴之臣，故不及國藩之號召力。而其為人則忠勤曠達，胸懷磊落，氣志堅毅，謀略深遠。尤其折節交歡，屈己下人，友愛與護持同輩，以謀湘系之團結發展。當時論者莫不交口稱譽，國藩自初即已引為同志。創軍之始，即加引重。如在咸豐三年初國藩致書林翼云：

「臘月十三日，忽奉幫辦團練之命，又聞武昌淪陷之信。義不敢潛身顧私，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為。遂於廿一日，馳赴省垣，日與張石卿中丞、江岷樵、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，思欲負山馳河，拯吾鄉枯瘠於萬一。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，亦無不屢稱臺端鴻才偉抱，足以救今日之滔滔，而恨不得合，以並紓桑梓兵後之餘慮。」^⑫

至林翼之對國藩，尤其傾心推服，出於至誠。自任湖北巡撫，悉力支持國藩，歷久彌堅。湘軍發展壯大，胡氏為關鍵人物。^⑬

林翼才識德量，後世交口稱譽，足以顯露英雄本色。當時人趙烈文述論胡氏性行，頗為中肯，見其同治六年九月初三日日記云：

「胡詠芝（林翼）頗得古人家數，金匱琛以貧乞返，立饋千金。鮑超母病，時致參藥。為子納羅羅山（羅澤南）之孫，以疆臣而為統將之晚輩。先惡劉霞仙（劉蓉），繼折節事之。皆英雄舉動也。使在開國龍興之際，李靖、徐勣，明初徐、常之流，殆必及之。惜哉不遇時也。」^⑭

林翼去世之後，湘軍精神領袖只有曾國藩為全局核心。幸而此時後繼人又有左宗棠於咸豐十年出山領兵，正足以承接胡氏故後之重大局面。左氏出山，已在湘軍承擔戰防全局大命之際，亦即湘軍真正出頭之日。相較曾胡昔日之艱難，實已漸入佳境。然左氏領兵自湘入贛，自贛入皖，自皖入浙，必須一路苦戰，方能達成平浙大功。自然憑才略毅力，其間難有微倖。但有一點必須了解，宗棠雖親兵事最晚，而自湘軍初起，歷年苦戰，宗棠實已身在湖南巡撫幕府之中，並非遊閒局外。且自始即為各方所重，胡林翼始終依信敬愛，推轂不遺餘力。當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兵潰，湘軍機運初轉，面對江南龐大局面。湖南才俊，一時俱被徵調，後起將帥，成

⑫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書札，卷二，第七至八頁。

⑬ 王爾敏：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湘軍之維繫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七期，第一五九至一八五頁，臺北，一九七八年刊。

⑭ 曾國藩未刊信稿，第三八六頁。

大功者則首推左宗棠。^⑯

湘軍創始，由江、曾、胡、左四位領袖所堅苦經營，並以四人為領導核心，其餘次要領袖，以及附屬人物，則依此四人為骨幹，團結一致。直接間接，貢獻才智能力，為湘軍圖謀發展。四人分別之背景憑藉不同，而各具號召條件。江以早著戰功為衆推重，曾以京僚大吏具備資格，胡以翰林出身並已遊宦外省，與曾在伯仲之間，左以才學抱負素著聲名，然其同等者若羅澤南、劉蓉、李元度，本無若何區別，而羅早歿，劉晚出，李敗衄，故稍有遜色，實則羅劉李並具核心領袖資格，惟時遇不及宗棠而已。至於諸人共同號召基礎，一則同為知書儒士，彼此相知而具匡時救世之同一志節。一則俱富忍辱負重刻苦奮勵精神。王闔運言貞定堅苦一端，頗舉湘軍領袖為例，茲引其說云：

「自宋以來，學者皆以堅苦耐貧為先。余所見先輩儉叢極矣。少年氣盛，頗不然之。在曾軍人皆衣布，余獨衣帛。晚飯乾菜，余獨食肉。以為節行不在此也。其後諸公各富貴，亦稍稍改故態。唯獨劉蔭渠自在書院時敝衣憔容，及為總督其容不改。余又竊嘆歲寒一色，唯我與爾然。蔭渠所設施不能過胡詠芝，而詠芝揮霍，歛唾萬金。益信奢儉無關政學之優劣也。及身教授，多見英賢，經歷三十年，求如爾時曾左伯仲，蓋不多有。無論其他，往往未富貴而已改易。乃知人不貞苦果不足恃。諸公不滿人意者，學不足也。其立功名者，能耐苦也。余雖不堅苦，而不畏貧。今之賢哲，殆所謂一貴不復可賤者，尙能任天下事邪。子貢欲濟世，即是憂貧，人心先憂己之貧，而後思博施，孔子之教切矣。」^⑯由此可以略見湘系核心分子之特色，當知其團結運用發展成功之意義。

三、中層領袖分子

江、曾、胡、左四位領袖，構成湘系發展核心，自為事後可見之結果。實際湘軍中其他人物，決非毫不可能成為核心分子，然世勢變化紛乘，人事際遇有別，戰爭酷烈，兵將出入白刃，身冒鋒鏑，不知使多少英雄豪傑飲恨而終。此間所論較次級之領袖分子，據史事影響而為言，非所以評騷人物高下之意。

湘軍初起，羅澤南以儒任兵事，經歷四載，轉戰贛鄂兩省，軍威聲名，與日俱增。無論德行學識，軍機政略，羅氏實為湘軍核心人物之選。但不幸於咸豐六年

^⑯ 王爾敏：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湘軍之維繫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七期，第一五九至一八五頁，臺北，一九七八年刊。

^⑯ 王闔運：王志，卷一，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。

三月在武昌陣亡。湘軍創興，澤南領軍，自爲大枝主力。戰陣練勇之暇，不忘讀書，且不忘著作。其在九江致書劉蓉可見：

「久居潯陽，鬱鬱不自得。練勇之暇，即覽周易。於進退消長之理。頗有所得。古人於憂患時作之，吾人於憂患時讀之，愈親切而有味也。因本義以卦變之說，釋彖傳上下往來字義，似非作易本指，妄以管見附於其末，未知足備一說否。寄呈一編，祈吾弟與濂帥鑒定之。不宣，」^⑰

澤南門人弟子，多承其陶冶，身後名將如王珍、李續賓、李續宜、蔣益澧、楊昌濬皆爲羅氏弟子，續宜、益澧、昌濬並位至督撫。曾國藩盛稱羅氏學問兵略，並其師弟之建立功勳。國藩論定有謂：

「羅忠節公澤南以諸生提兵破賊，湘中諸生，多拯大難立功名，大率公弟子也。公在軍四載，論數省安危，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。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。其臨陣審固乃發，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。好相度山川脈絡，又其講求輿圖之效。君子是以知公之所蓄積者夙也，非天幸也。」^⑲

羅澤南陣亡之後，所部湘軍由其門人李續賓接統。續賓忠誠謀略，素爲湘士所重，亦足爲核心人物之選。故澤南故後，湘軍聲勢未見減色，並能轉戰數省，所向無敵。曾國藩與胡林翼均備加推重，國藩評論有云：

「湘軍之興，威振海內，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，大之者李忠武公續賓也。巡撫胡文忠公林翼惟二公言是聽。忠節挈持大綱，其戰守機宜，胥李公主之。李公含宏淵默，大讓無形，稠人廣坐，終日不發一言。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，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。端凝敦篤愛人，不尚美言，而意溢於色，色餘於辭。雖他軍之將士，逃難之流民，皆歸之若父兄，聞其死哭之皆慟，至不忍聞。」^⑳

林翼詳論有云：

「廸公（李續賓）天姿近道，木訥厚重少文，蓋絳侯（漢周勃爵號）也。其思念濂公，欲援江西，是血性中人。」^㉑

可惜在咸豐八年十月，續賓領湘軍進攻廬州，戰死於三河鎮，殆至全軍覆沒，湘軍精銳盡失，實爲湘軍建軍以來，最嚴重打擊。

⑰ 盛康編：皇朝經世文續編，卷八十五，第十九頁，羅澤南致劉蓉書。

⑲ 王定安：求闕齋弟子記，卷二十三，第十四頁。

⑳ 同前書。

㉑ 胡林翼：胡文忠公遺集，卷五九，第三頁。

續賓陣亡之後，所部殘餘，由其弟李續宜拊循編練成軍。續宜精嚴縝密，不及續賓之寬厚博大，雖未足為湘軍核心領袖，實可為獨當一面之將帥。湘軍新敗之後，全恃續宜一力維繫經營，轉戰皖北，援護鄂邊。所統萬人，亦為湘軍勁旅，曾國藩胡林翼均極加護持，視為湘將碩果。國藩評論有云：

「李勇毅公續宜，忠武公續賓之弟也。少好深湛之思，師事羅忠節公。忠武殉節三河，將士死者六七千人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，經緯萬端，入則損食悲咽，出則拊循潰卒。思鄉者遣歸，願留者編伍，哺粟賜衣，接以溫語。差討諸將之罪，而簡用其良。部署粗定，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，相與申儆簡練，而湘軍復振。公與忠武皆負重名，淡於榮利，忠武好蓋覆人過，公則嫉惡稍嚴。忠武戰必身先，驍果縝密，公則規畫大計，而不甚校一戰之利。至其臨陣，百審一發，發無不捷，成功一也。」^②

林翼器重續宜，時加護持，合力以挽湘軍頽勢。胡氏致書國藩，可知其期許依任之專：

「全軍然後能保楚，保楚然後能謀吳。此理至明，聖人不易。楚軍之將，希庵（李續宜）如碩果，如魯靈光，無論其勳勞甚大，品行絕高，固當為國家愛惜保護之，卽林翼私交，亦實有不可相離之隱。林翼同行，則希公只管兵事，戰無不勝。其官事外事及竟外無限之事，均可代勞，此其為力也。」^②

羅李一枝固定構成湘軍重要骨幹，曾胡以為主力所在。然討論湘軍將帥，猶有其他重要各枝。而創軍最早並自成獨立體系者則惟王珍所部之湘軍。「湘勇」一詞，並在最初成軍時出現。初始進援江南，俱稱湘勇。^③ 王珍亦為羅澤南弟子，並

② 王定安：求闕齋弟子記，卷二十三，第十四至十五頁。

② 胡林翼：胡文忠公遺集，卷六十，第一頁。

③ 王壯武公遺集，卷十七、第十一頁：咸豐三年八月十四日王氏上雙親書，言及「湘勇」之詞：「日內接子由江西龍泉潢東樂昌仁化等處回者，言無處不震湘勇之名。從此威名漸著，當不獨郴桂一帶民人得安枕也。」又，同前書，卷一，第八至九頁，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稟云：「前因粵匪上竄湖北，奉憲臺面諭召募湘勇數千名赴援鄂省。當蒙獲給餉銀五千兩，並飭湘鄉錢漕項下銀五千兩歸湘召募。並製辦一切軍器。卑職奉此，卽日轉湘招集健勇四千餘名，並配置軍器旗幟號衣火藥火箭大礮等件。旋於初四日接奉憲召批示：暫招湘勇三千來省堵防。續於初七日奉憲札，以庫款不敷，減留二千，趕急帶赴省城，聽候調遣。卑職奉此，是以於本月初九日卽帶湘勇千餘名來省，隨請候補府經歷縣丞吳坤修，及各紳友等，將已招齊留湘之勇尙有二千餘名，嚴行撤汰。卑職到省日，又奉憲諭，武昌告嚴，督部堂有札派勇往援，飭令卑職卽帶見在新招及舊練之勇共三千四百二十八名。卑職因於十五日星馳旋鄉，十八日早復帶勇二千名，並雇長夫千餘名，一齊下省。十九夜二更抵會垣，疊奉憲諭備赴武昌，卑職一面訓練各勇，一面籌辦行裝，尅期啓行。茲因欽憲兩奉諭旨募楚勇數千前赴下游攻剿。復因督部堂有函來言，粵匪全數下竄，援鄂之行，可以少休。卑職前此本以扶病強出，此次承憲台重命。不敢推諉。今鄂省無事，自無容多此一行，惟卑職所募壯勇，雖未久經訓練，然而頗有頭緒，旗幟軍器等項業已措辦齊全。伏懇憲台卽日準賜開操，並懇委員點驗各勇及長夫等，庶見卑職此次奉辦未敢稍負鈞諭而虛糜國費。」

同在一軍爲湘勇創始人，嗣後擴大而分投各領一枝。王珍所部，自與各軍立異，號稱「老湘勇」。以別於後起之湘勇。

王珍字璞山，賦性剛烈，急進勇任。宗奉程朱理學，常自省其學養不足，修業無成，入世早，有損無益。故無意仕進。惟救世之念，每不能忘，終不得拔身引退，歸山讀書，恒引爲恨憾。^㉔王氏帶兵重組織，嚴訓練，自出杼機，自定營規，講求演練方法，用兵戰略。所部士卒，靡不讀書，出戰則上馬衝鋒，回營則投戈講學。構成一軍獨有家法，卓然異於曾國藩各軍。^㉕當時湘軍應援各地，王珍獨不願出省，志以保衛鄉里爲主，故其領軍多出入於贛湘之交，成爲地方一枝勁旅。王氏屢言抱負，尤見其光明俊偉行徑。如其致左宗棠書可資佐證：

「今日半壁之天下，恃一湖南撐持之，然其勢已岌岌也。珍雖不才，猶願隨諸君子後竭力維之。使此後稍有建白，中丞公再從而優敍之。萬一膺皇上特達之知，或簡放何缺，或調赴大營，此身出湖南一步，即不能回顧桑梓矣。珍至今日豈猶不知此身非已有哉。特以庸劣性成，吏治非其所宜，又安得推心置腹之大吏如中丞公者爲之效命也。祈先生乘閒爲中丞公言之，有以恕諒而兩全

^㉔ 王珍：王壯武公遺集，卷十七，第六至七頁，咸豐三年六月初二日致伯兄：「弟不學無術，託祖宗之福，賴諸友各勇之力，微幸立功，已二次矣。歸山讀書之志，猶未可以決乎。擬到省銷差，即當息影蓬廬也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八，第七頁，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致曾國藩：「至於珍之鄙願，則前在省時屢與公言之。學問毫無所成，不足出爲世用。前日不允所請，保舉今職，大非心之本願。此行扶病強來，實爲敝師之故。斷不敢濫邀爵賞，羞我友朋，皇天后土，實鑒此表。懇速放歸山中，使得從事學問，不終爲無珠之犧。則深感大德矣。」

又同前書，第九頁，咸豐三年七月十八日，致曾季洪：「珍拙懶之性，疾惡太嚴。童時未親名師益友，無以收其放心。成立而後，凡縣中除盜及諸不平事，輒攘臂與焉。不但爲杞人之憂，且常欲學移山之愚，務外爲人，並不知非性分之所應爲也。近年來痛自悔艾，輒椎胸飲泣，恨學問之無成，歎光陰之不再，棄儒從墨，大爲吾黨所羞。因改額山房曰自芸。思屏絕一切，研究典籍，篤修躬行，稍釋前日之疚，奈好事之名已出，不復能收。前年朱石翁革除錢糧弊端，勸捐補款，強促相助，紛逐半載。去歲又爲團練事積勞成疾，至冬閒省中募勇，珍力求免，而石翁與吾師復苦相迫，今又忽忽半載矣。此處事辦妥後，決志辭歸，萬望賢弟先於令兄（指曾國藩）處善爲說辭，假以歲月，俾得少有成就，則受賜實爲無量。」

^㉕ 郭崑灝：雲臥山莊尺牘，第四六至四七頁（文海景印本）：「往聞王壯武治軍，出隊則上馬衝鋒，回營則投戈講學，其數勇皆令日誦四子書。駐軍之處，書聲琅琅，故紀律較諸軍爲特勝。至今老湘營出身者。猶秩秩有文焉。」

又，王壯武公年譜，卷上，第二十三頁：「贛興國胡氏發琅信游勝記云：中興名將，人但知羅忠節澤南、忠武塔齊布，暨江忠烈忠源三君鼎立。而不知智勇兼絕足與三君方駕者，有王壯武珍。中興之軍，莫不用曾文正營制，獨壯武否。著有練勇劄言一卷，故諸將頗怪之。諸將立功顯地，而壯武始終轉戰湖南江西山縣中。又不幸早卒，故知之者寡耳。」

又，同前書，同頁：「義寧陳氏三立練勇劄言跋云：湘鄉王壯武公，始與曾公國藩並起鄉里，並號爲湘軍。時曾公資望高，將帥言兵者壹用曾公成法，轉戰六州。公獨別爲一軍與之異。卒立奇勳。後公既歿，偏裨仍之。以所部橫馳天下，猶稱無敵。天挺人豪，獲其智略，綯一代中興之烈，偕於戡亂捍難而止耳，奚異同因變之足云。」

之。」[◎]

王珍固自卓然立異於湘軍各枝，獨力作戰而不應調外援。然於並時湘軍領袖則無不敬重。屢屢盛稱江忠源、羅澤南、塔齊布、李續賓、楊載福（岳斌）、彭玉麟、劉勝鴻、曾國藩、胡林翼等，惟與曾國藩之分道揚鑣，實亦基於自立創軍之一念而已。^② 王鑫任事負責，督軍精勤。每患病請假，旋里調治，終以事急復起，力疾領兵，少得息養，竟不幸於咸豐七年八月病歿軍中。^③ 王氏故後，其軍由部將王開化、張運蘭接統，嗣後「老湘勇」亦被徵調外援，轉戰各省。且隨左宗棠遠征西北，劉松山即為後期統帥。由勇目出身，亦為王珍陶訓而成之將材。

至於曾國藩為湘軍公衆領袖，團結核心，湘軍水師尤然。原自無所謂國藩自領之軍，其足以堪稱國藩嫡系部衆者，則惟其弟曾國荃所統帶之「吉軍」稱是。「吉軍」成軍於咸豐六年，原始主人本為長沙人黃冕，因任吉安知府，委託曾國荃在故鄉募練一枝湘軍，進援江西吉安，以國荃總理營務。所謂吉軍之名，即由來於此，故與國藩本人毫無絲毫關聯。及國荃帶兵至於吉安，接戰之後，自無從擺脫，^④ 國

[◎] 王壯武公遺集，卷十，第四頁。

^② 同前書，卷十一，第三八頁，咸豐六年十月初四日致胡林翼函：「珍以菲材，待罪戎行，數載以來，絕少補救。清夜捫心，究難自安。每念時艱，非多得忠義為懷歷久不渝者不足以挽之。而回顧茫茫，殊難屈指，此珍所以痛惜於江、吳、塔、羅諸公之亡，而不能不深有希望於先生及滌帥與迪兄也。」又同前書，卷十四，第七頁，致楊岳斌函：「珍嘗語人曰：當今賢豪如閣下與迪翁者，吾願為之執鞭。而雄才大略，驅駕一切，則迪兄似猶有未及焉。嘻嘻；潰流橫決，惟同心者可以共濟。奈何江君不祿，吳老旋陷，塔帥云亡，羅師繼隕，晨星寥寥矣。珍不為閣下與迪兄之望而誰望乎。彭雪翁義俠丈夫，與珍僅識面，而於閣下則同舟最久者也。近聞其患病甚劇，竊為時事憂，既作書慰問之，而於閣下尤不置已言焉。故復致其區區之誠，閣下勉乎哉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二十二，第二九至三十頁，咸豐七年七月二十日，日記：「康稟稱：瑞卅於十五日卯刻克復，而峙兄（劉騰鴻）殉之。痛哉！何老天之慳吝良將掃蕩逆氛一至此也。念國家鼎沸之秋，正賴二三君子相與撐持，以挽狂瀾於既倒。雖烏公不祿，江老旋陷，塔帥云亡，羅師繼隕，而後之繼起者亦應長留天壤，力剿妖氛。而迺忠勇如峙兄者遽又奪去。已焉哉！天實為之。謂之何哉！然天心雖未厭亂，人力亦可撥治，誓與李楊彭劉諸公，斬盡渠魁擣殘巢穴，斯國民之望克副，而友朋之憾堪洩矣。」此日記後未及半月，王氏亦於八月四日病歿軍中。

又曾王不合，起於創軍之初，自咸豐三年即已分投領軍矣，其間相離之機，略見於曾文正公書札，卷四，第十三頁，致駱秉章書云：「王璞山（珍）本是侍所器倚之人，今年於各處表襮其賢，蓋亦口波於贊揚，手倦於書寫。其寄我一函，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。近時人有向余譏諷璞山者，亦與之剖雪爭辯，而璞山不諒我心，頗生猜嫌。侍所與之札飭，言撤勇事者，概不回答。既無公牘，又無私書。曾未同涉風波之險，已有不受節制之意。同舟而樹敵國，肝膽而變楚越。將來侍若外出，恐不能不另行招募，重費錢財。」

^③ 王壯武公遺集，卷十，第四四頁，咸豐六年六月初八日致段潤身函：「前者因病請假，已蒙中丞許諾。不匝月而邊禦四起，強令視師。茲又將由衡進省，面稟一切。即求稍自休養。每念天下多故，桑梓情切，無才無學之身，又復同蒲柳，竊以有悲者，憫世焚蕪孤立，深懨無補將伯之呼，安能自己也。」

^④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家書，卷四，第十五頁：「沅弟（曾國荃）能隨南翁（黃冕）以出，料理戎事，亦足增長識力。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幹大事，而不甚著聲色，弟當留心仿而效之。夏憩兄（夏廷樾）前亦欲辦援江之師，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。渠係簪纓巨室，民望所歸，又奉特旨援江，自不能不速圖集事，惟與南兄共辦一枝，則衆擎易舉，若另籌一路，則獨力難成。沅弟若見憩翁，或先將鄙意道及，余續有信奉達也。」

藩致函切勸速離兵事，竟而未果。⑩嗣後黃冕反而抽身他去，徑將吉軍託付國荃一人統帶，無意之中成為湘軍主力。且自圍攻安慶，以至圍攻金陵，俱任全局戰防重心，關係極為重要。及至國荃攻破金陵，戰局底定，為湘軍建立首功，上下獲致爵賞。自得力於國荃之苦心經營，吉軍成就至此亦達於頂點。⑪

湘軍陸師之外，尚有水師，關係湘軍全軍之維繫及戰局優勢之掌握。曾國藩創立湘軍，為近代勇營開闢前規，承擔晚清五十年國防任務，固足稱為國藩顯著之功業。然若探究湘軍扭轉戰局之成功，則湘軍水師肅清江路最為重要關鍵。抑且湘軍陸師，頭緒繁縝，各大枝統將，獨立募練，俱成勁旅。惟湘軍水師則純為國藩一人手創，並始終單純一系，並無第二枝不同領袖之水師出於湖南。當世識者如胡林翼即以練水師為國藩獨特之本領。王闔運謂為國藩功業之首。⑫

湘軍水師人才，重要者為楊岳斌與彭玉麟。楊領外江水師，彭領內湖水師。二人皆為獨當一面將帥之才，楊尤才識卓越。後期又增練淮揚水師，由黃翼升統領，太湖水師，由李朝斌統領，二人俱出身湘軍水師，同屬湘軍水師系統。黃李均武將之才，不及楊彭遠甚。

至於在曾國藩主力系統之外，尚有江忠源所遺一枝楚勇，創軍尤早於所有湘軍，當時以省命名之軍，亦惟有楚勇。江忠源於咸豐三年冬殉節於安徽廬州。其軍由劉長佑、江忠淑接統，獨成大枝軍旅。劉氏賢名早為湘士稱頌，曾國藩、胡林翼亦屢屢言之。然而彼此各自發展，始終無合力之機。林翼計欲招致湖北，亦未成功。劉氏楚軍，始終盤旋於江西、廣西兩省之間，其部下有三賢將齊名，即劉坤一、江忠義，李輔朝三人。⑬嗣後劉長佑調升，其軍由劉坤一主持，直至平定太平

⑩ 同前書，第十六至十七頁：「至沉弟之所處，則當自為審度，辱南翁青昧，代為整理營務，送至吉安，無論戰之勝敗，城之克否，即可敬謝速行。或來章門與余相見，或歸里門侍奉老親，無為僕僕久淹於外也。此事登場甚易，收身甚難，鋒鏑至危，家庭至樂。何必與兵事為緣，李次青（李元度）上年發憤帶勇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日昨撫州一敗，身辱名裂，不特官紳嘆有煩言，即其本邑平江之勇，亦怨詈交加，兵猶火也，易於見過，難於見功。弟之才能，不逮次青，而所處之位，尚不如次青得行其志。若順兵吉安城下，久不自決，以小戰小勝為功，以勸捐辦團為能，內乖督令之義，外成騎虎之勢，私情公誼，兩無所取。弟之自計，不可不審，與憩兄南兄約，不可不明也。」

⑪ 郭崑齋：雲臥山莊尺牘，第二二四頁，致曾國荃：「往者蘇常杭嘉之捷，並藉助於西人。閣下此次自將一軍，無所依傍，非獨挽目前之全局亦可見天下之有人。斯更有識之人所額手稱慶心悅誠服者也。」又同前書，第二八八至二八九頁，致曾國藩：「沅公住省四日，即便還家。病容雖未盡除，而精神仍復如舊。功成身退，昔人所難。季高羨其福命之大，霞仙歎其何修得此，家兄來書，則曰：班生此行，何異登仙。可無庸更抱抑鬱矣。在省暢談三次，偶有不平之鳴，輒以此言進，休息數日，必能夷然曠然也。」

⑫ 王文賢：「湘軍水師的創立及其發展。」歷史學報，第一期，臺北一九七三年刊。

⑬ 王爾敏：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湘軍之維繫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，第七期，第一五九至一八五頁。臺北，一九七八年刊。

軍，坤一亦獲任江西巡撫。

湘軍建功立業，屢仆屢起，陶鑄人材，前後相承。大枝軍旅固如前述，然尚未盡攬全局。當日援川湘軍，前有蕭啟江，後有劉蓉。援滇者有劉嶽昭，援贛者有席寶田，援黔者有李元度，守湘者有趙煥聯，雖在湘軍主力之外，而各立功名，各有建樹，尤足以擴大湘軍聲勢，各路豪傑登場，並可謂集一時之盛矣。

四、締造經歷與發展關鍵

湘軍創軍基礎，人材實為首要。而人材所恃，志節識力尤為重要關鍵。志節識力之運用，即為謀畫策略之所出。舉凡湘軍領袖之才略、學養、識見、經驗以至任事之勇毅，俱在策略設計與展布中表出。勝算決策之始，在於曾國藩之募練湘勇。獨主募勇練勇特色，既不同於綠營之世兵，亦不同於義勇之團練。而實為別具面目特質之一種軍伍。此點實為湘軍發展之原始基礎，凡言湘軍者殆無不知之。

國藩募練湘勇，源源接濟，兵力不匱，實已立於不敗之地。多年艱苦支撐，屢敗而不氣餒，固在其堅貞沉毅之楮持。而募練有法，湘省兵源可恃，更為得自最初策略之成功。

湘軍固可募練，然進取之師，轉戰於南方湖泊河港之間，必為水上之敵所困。故制勝算之上策，必先破敵水師，欲破敵人水師，宜先自有能戰之水師。當時曾國藩取此決策，毅然自練湘軍水師，並時各省疆無一人作此籌計與行動，惟曾國藩克服萬難而為之。取決行動之初，曾氏函告夏廷樾云：

「石卿（張亮基）制軍岷樵（江忠源）中丞誠為當今人傑，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入告，請以兵柄歸之張江兩君，似亦無難仰邀允。惟弟竊有慮者，向、琦在南，訥、恩在北，慧、雷、勝、托之儔，聯翩四布。張江再出，亦不過十數人外添此二座。若別黑白而定一尊，抑此諸將，獨以張帥經略南服，則朝廷大權，非臣下所得專請。且目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，而在兵勇之習氣太壞。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，以岷樵之勳名，而不能禁楚勇之潰。蓋習氣太壞，染之已深，無可用之兵勇故也。兵勇既無一隊可用，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，無餉項以練新卒，雖張帥為之，弟亦不敢必其有濟。中夜以思，徒用浩歎。閣下不欲赴鄂，亦因事無把握，未肯輕出。鄙意此時急務，總宜先籌水師。自六月以來，五省皆議此事，屢奉寄諭，亦以為最切之圖，而至今未有所成。弟欲於此稍盡寸心，乃與辦木簰，則苦雨半月，無從下手；改造民船，則

經費支絀，買船無資。兀坐氣短，閣下將何以教我也。」^④

嗣後湘軍應援江南各省，歷經百戰，克成大功。其基本所恃，即得自於最初募練水陸各軍之決策，且全然本於曾國藩之卓識遠見。國藩當為湘系核心領袖，並必至建立不世勳業。實為固然之理。

湘軍建軍策略，打定穩固基礎，進一步運用，其用兵動向，起始即在於征討太平軍，而並不盡以保衛湖南為職志。創軍之初，即出省首援江西，嗣後十餘年間，江西始終為湘軍用兵之地。無論就湘軍根本，或進求開展，湘贛唇齒之邦，關係極為重要。當世識者，以為立足戰略，不能不先顧江西。王闔運即作此論斷，而歸功於湘撫駱秉章：

「江西湖南唇齒，自曾軍出時，謀者已言：當出軍剷體，乃能自立。秉章委事左宗棠，宗棠聽其言。以力不足故罷，未一歲，湖北江西并淪陷。湖南力愈不足，乃始汲汲治援軍。尤傾國以事江西。殆所謂收之柔榆者耶。鄉使秉章不聽宗棠，宗棠復持力不足之說，則湖南之亡可待也。湖南亡，而曾胡湘軍亦終困頓漂散，無以自固。然則洪寇之滅，湖南之盛，援江西之力也。而論者曰：此非願所及，會有天幸，乘國運稟廟算耳。則江浙何以傾覆，閩廣何以不振，秉章之功焉可誣哉。」^⑤

湘軍創軍方針與原始進兵方略，為其後日一切發展基礎。湘軍領袖雖身在極狹隘局面，極簡陋規模，亦不厭遠志深謀，創立可大可久可進可退之建軍宗旨。實為湘軍成功之固有資本。

湘軍領袖抱匡濟宏志，以天下治亂為己任，創軍伍以拯斯世，自己盡傾智慮而全力圖謀。然則天道人事，毫不可測，變幻譎奇，魔刧百出。創軍固不易，維持尤艱難。湘軍領袖所遭遇折磨與掣肘，迂曲委婉，真足顛倒英雄。其出於人事之繁者，一為各路主帥之忌刻歧視，一為餉地主人之傾擠掣肘。王闔運所形容，極盡當日人事情狀：

「當是時，封疆大臣雖見危敗知死莫肯言已短，曾國藩所至見齷齪，秉章親遘之。至欲資餉地主，則撓謔百方。唯獨崇實懇懃，推賢能常若不及，秉章在道頻奏訴餉匱，初不意四川能供其軍。比至，未入境，總督公文手書殷勤通誠，遣官候問，冠蓋相望，悉發夔關稅銀資軍，湘軍喜過所望。」^⑥

事實上當咸豐三年湘軍創軍之始，即已頻遭人事之麻煩，劉蓉曾函諫江忠源，

④ 曾國藩：曾文正公書札，卷三，第三六至三七頁。

⑤ 王闔運：湘軍志，卷十，第一至二頁。

⑥ 同前書，卷十三，第四頁。

申論曲意和衷之道。^⑦

當日封疆大員，列首要者爲江南大營各統帥，則向榮、琦善、和春爲是。其次江南各省督撫，尤以爲江南大營供餉應援之江浙大吏稱是。而方起家湖南鄉曲之湘勇，尚不足與於偏師之列，在疆吏眼中，何嘗有分毫地位。初則譏嘲戲謔，予湘軍將校種種難堪，繼則忌恨畏憚，惟恐湘軍之到臨。而湘軍領袖卽在此種政治氣氛中忍辱負重，力求發展。其當權之江浙大吏尤與湘軍領袖不協。^⑧

^⑦ 劉蓉：養晦堂文集，卷五，第二四頁，致江忠源：「迺者濂帥（曾國藩）以事多掣肘之故，不滿意於羣公。弟嘗勸之，以謂當國家多難之秋，總宜以宏濟艱難爲念，彼卽不必皆賢，而未必至於不肖，正使遂至不肖，然既不幸與斯人並世而生，又不幸與之同僚共事，亦惟有推諱相與，婉曲求濟之二法。譬人家猝遭禍變，門祚顛危，岌岌可慮，而父兄子弟方各以私意相競，則必爲之竭誠殫慮，涕泣相勸戒。至於甚不可回，猶再三反復焉。而不厭其有調護之力，雖夙昔所不屑爲，猶不憚躬爲之。惟其爲宗祀存亡所繫，痛切於身，而不忍以秦越視也。故爲大臣者，誠有公忠體國之心，則將恪慎憂勤，視國事如家事，視僚屬如弟昆。摶和衷以偏察羣情，豁虛懷而兼納衆慮，卽其矜才節智，好爲異詞，挾詐懷私故撓公議，猶將憐其愚昧，力圖運旋，不忍任吾意而遽生鄙夷決棄之思，積時既久，恩志潛消，肫摯之忱，智愚共喻，天下事乃可以惟吾所欲爲，而不虞其或格。蓋自古迄今，未有至誠懇切，積時日相感孚，而人猶不諒者。」

又同前書，第二五頁，致江忠源：「春初聞奉旨趣赴大營幫辦軍務。慶幸之至，轉抱私憂。以彼武夫蠻材，尸居重任，旣乖人望，或長矜誇。而尊兄以儒生崛起，爲之佐貳，志操心術，本已殊途，形迹之間，易生嫌隙。如或薄其猥陋，恥與爲僚，旣鮮和衷，豈能共濟。故輒婉告唐君，代達鄙意，謂此行克敵之要，在於戰勝一心，而在不決機兩陣之際。破賊之謀，難於運用一帥，而不難於指揮三軍之士。鑑有以大服其心，不相牽制，則事無不濟，功無不成。而唐君未喻深心，但以不和爲說。故區區私懷，卒未達於左右。茲因便羽，輒布愚衷，心之精微，非紙墨所能罄。惟尊兄卽鄙論所及，推廣以盡其餘，得其所已言，則其所未及者固可得而默喻也。」

^⑧ 王闔運：湘軍志，卷七，第一頁：「自冠據江寧，江南大營恆爲浙輕重。傾浙財賦供餉，歲銀幾百萬。湘軍乏於資，則羨覬之，然浙江故無事於湘軍，湘帥浙撫每不相能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二，第九頁：「方事之急也（指靖港之役），布政使徐有壬（後任江蘇巡撫城破殉職）逃室走達旦，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，請罷遣曾軍，語倨妄甚，巡撫語有壬且待之。及克湘潭，國藩猶待罪，俄而得溫詔，且授用塔齊布。文武官大懼沮，有壬詣國藩頓首謝，城中防兵，聞代大將，皆驚服，以爲天子明見萬里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一，第九至十頁：「塔齊布以都司署守備，僅二年超擢大帥，新從湘潭立功歸。受印之日，文武民士聚觀相歎詫。雖起豹（提督鮑起豹）儻從亦驚喜，以爲皇上知人能任，使軍氣始振焉。是時，依故事提督列銜在巡撫前，曾國藩以事降黜，名又在巡撫後，而塔齊布謹事國藩，自比於列將。徐有壬等皆詣國藩賀，且謝罪。詔令國藩擇司道大員隨營主餉，有壬等惴恐在選中，國藩笑謝之。謂所親曰：此輩怯懦，徒敗吾事，雖請同行，吾固當止之，況不欲乎。」

又郭嵩焘：養知書屋文集，卷十、第七至八頁，復羅小溪書，評論江南大營兵潰後之江浙大吏云：「來書論王薛諸公（指浙江巡撫王有齡，江蘇巡撫薛煥），直探本原。可謂名論。江浙之禍，久在意中。所恃江南一軍而已。相持十年，勝敗之數必有所歸。一軍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，然且處堂而嬉，般樂怠傲，無挾自恃。論者訝其禍之速，自蒙觀之，相持十年，禍已遲矣。」

又胡林翼：胡文忠公遺集，卷七六，第三頁，致嚴樹林，論江南大營兵潰後之江南大吏云：「徽帥（張芾）月費三十萬之餉，浙帥（王有齡）月費五十萬之餉，問其兵則答曰六萬人三萬人也。問其謀與其摺奏，則人盡冒爲吳孫彭韓矣。乃急則求此不足萬人之曾濂帥，且惱羞成怒也。湖南各軍，弟已羽檄交馳，然非七月杪不能到防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七八，第十二頁，致左宗棠云：「且濂帥奉命已久，吳人喜極生怨。六月於茲矣，水深火熱之情，亦無怪其日夜引領。凡將帥之是非，朝臣之疑謗，均可一笑付之。而士論民情却宜顧念，吳人好歌謠善著作，顧亭林言明史最精確。林翼讀明史，則嫌其誣罔不信。明史均吳人手筆也。濂公之德，吾楚一人，名太高望太切，則異日怨謗亦且不測，公其善爲保全，毋使蒙千秋之誣也。」

又東南紀略：「通州遞到四月十九日諭旨。始知曾侍郎節制兩江，人人共幸更生。喜其來而恨其晚也。而常熟以上，節節沮梗。各大吏之在上海者，素嚴憚曾侍郎，亦不願其卽來。江北各員，以公文相推諉，延擋十日不得發，究未知曾侍郎行抵何所，已奉到諭旨與否？」

近世學人以濟餉優紬，斷爲綠營敗壞關鍵，及湘軍成功要素。殆已形成中外共遵之定論。然其說浮泛，只見會典表面文字，而不察酌當日各軍餉源用歟實際。因是論定湘軍食餉，遠厚於綠營。此說不惟流於錯誤，抑且與實情完全相反。十年前已於淮軍志中勘正之。^③ 湘軍創軍以來，始終乏於軍食，依仰各地督撫，寄食爲客，時受排擠。湘軍發展過程，爭餉實爲首務，蓋比募勇練勇難過十倍。爭餉關鍵，在於爭地方主客之勢，換言之，必須由湘軍將帥任地方督撫，軍食纔真有著落。^④ 雖然如此，迨咸豐十年國藩受任兩江總督，主持江南四省軍務，餉源固已好轉，而因增兵快速，湘軍軍食仍然大費周章，甚至遠向廣東求解釐金。情況固已大爲改善，軍中欠餉仍屬難免。^⑤

^③ 王爾敏：淮軍志，第九至十頁。

^④ 王闡運：湘軍志，卷十六，第四頁：「湘軍初起時，水師大將從南海新來，當設宴，議用錢二萬，猶咨嗟以爲巨費。其時江南糧臺委員，自蘇至齊，公館八所，帷帳姬妾，不徙而具。徒以坐潰，而湘軍起貧苦，同飢餓，轉戰五千里，餉皆自釐金給之，雖復頻奏徵餉四川廣東，率爲其督撫所持，所望十不償一二。」

又同前書，第一至二頁：「洪寇之興，始由部籌餉撥軍者六百餘萬。其後困竭，則以空文指撥，久之空無可指。諸將帥亦知其無益，乃各自爲計。其計有二：捐輸釐金是也。二者皆起於戰國秦漢之時，而捐輸爲最拙。又流敝滋大，害於風俗，胡林翼之言曰：今之言兵者喜圓練，言餉者急捐輸，及大錢鈔票，樂其不費而取利也。上苟持一無本取利之心，則政事墮敗。令甫下而民窺之矣。捐輸之所行，必避富貴權勢之家。曾國藩初治湘軍，慨然欲抑豪強，摧並兼，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。澍子憲於巡撫，籍其田產文券送藩司。官士大譁，遂以得免。其後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，當先大戶，是時曾國荃號有百頃田，於法當上戶，榕不能問也。而京朝流言，卒以敗榕。故凡捐輸，徒以虐良善，肥不肖，行之愈久愈不效。」

又曾國藩：曾文正公書札，卷九，第十三頁，致劉蓉：「此閒餉項日紬，專取給於湖北江西兩省，外省至無涓滴之益，江西又不時至，竟不能添立新營。」

又陶風樓藏名賢手札，卷二，彭玉麟致曾國藩：「麟欠餉半年有餘，忍饑不言，故外人不知，而以爲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殊不知枵腹從事，撐餓肚漢做空架子，轉瞬亦將不得了耳。故前此求飭江西還墊普軍一萬四千餘金，倘稍可支持，即不索償也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六，郭嵩焘致曾國藩：「聞南翁（黃冕）言，厚庵（楊岳斌）窘況甚岌岌，渠與南翁述及，至於流涕。此次提解月餉，似不可不稍應付之。不識雪琴（彭玉麟）光景如何，能不需乎此否？」

^⑤ 曾國荃：曾忠襄公書牘，卷三，第十頁，致黃冕：「長公（指曾國藩）自治兵以來，籌餉恒穩守六字訣，往往因噎廢食。蓋其爲客時，慘淡經營以謀之者，屢多畫地爲餅。深知主人強而有力，不令客自飽其羹餐，故至今猶視爲畏途耳。」

又同前書，卷四，第五頁，致郭嵩焘：「粵釐事，客阻於主。北辛氣味甚馨而辣。所論漫無道理。經此一番波瀾；或亦知覇道祇可雄於一時而不可行於長久乎。然欲持此項而濟征吳之軍，終恐杯水不足以救車薪之燄也。少泉（小泉之誤）由皖而滬而粵，中秋日乃啓行。弟初意粵釐當有所獲。又冀恃楚邊無警，經費不紬，可謀協濟之方，將爲增竈之計，以長圍困洪逆於老巢。今既移步換形，遂不設此想矣。擬就現成局面，安心忍耐，坐待大兵雲集，以畢茲役耳。」

又曾文正公手書日記，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記：「隨龍淵來商放餉事，余議以五萬發無爲運漕各營，以三萬發鮑軍各營。以一萬發淮揚水師，下留三萬餘分發城內各營，及徵休買米之用，今冬過年，竟不甚艱窘，亦初念所不料者也。」

又曾文正公書札，卷二十八，第五三頁，致富明阿：「此閒餉項亦已奇紬，積欠至十八九箇月不等。名爲金陵各勇月支四兩二錢，霆軍月支四兩，實則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，閒或一月並未支得一兩，霆營轉戰南北，尤爲窮苦，貴部在丹陽等處，與霆軍互相往來，當可得其大略。聞滬軍所得較優，楚軍亦甚窘迫，特比敝處稍豐耳。」

湘軍創軍之後，雖然應援各省，實則就食作客，謀求自立不墜而已，何曾有力量大事開拓。其發展關鍵實在於外在機遇之種種變化。多年苦撐，則為適應一切危困局面之資本。至於所逢之最佳機遇，則為江南大營之二次兵潰。因是至咸豐十年始遇重大發展機會。

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兵潰之後，四月十九日即授曾國藩任兩江總督，嗣後授欽差大臣節制四省軍務。國藩既任軍事最高統帥，又為三省地方之長，兵權餉權，俱歸掌握。正可乘此施展，並為湘軍開拓良機。然國藩所部一萬湘軍，一時如何當此龐新局面。此外可供調遣者李續宜所部萬人，以及胡林翼統下之多隆河、鮑超，亦不足萬人。然尚有兩湖後路必須照顧。此時吳越方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急求救援，二年之間，謀兵之士迭言兩湖三江五省聯合用兵，粗計兵力需十三萬人。俱寄望國藩、林翼從事經營。^②

^②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，第二集，卷四，咸豐十一年四月十日，張曜孫致王子壽：「默觀大局，殊切憂煎，乘輿僻處漢陽，近復有朝陽赤峯竊發之實。戕官劫庫，烽逼屬車。直隸山東，全省抗糧，寇盜紛起。豫中捻匪縱橫已甚，北至長垣，南至光化襄陽。僧邸三敗於濟寧曹州，塗地不能復振。西巡大計，無人解決，中原無主，梟獍聽張，如此情事，雖宋元之末，有所不逮。東南半壁，苟江浙不復，亦難久持，物力民生均有日耗日蹙之勢。若因循數年，楚力必不支，楚不能支，皖蜀江右勢成瓦解。此東南之憂，亦天下之憂也。比來營次。日與宮保（胡林翼）籌商。竊謂及此未耗未蹙之時，上游宜速籌至計。自古平吳，必係上游之力，惟有合西蜀兩湖江右皖中五省之力，以平江浙。江浙平而東南可保，東南存而西北乃可經營。其法：五省合力養能戰之兵十三萬人，以二萬為安徽防勦之師，以二萬為四川防勦之師，以三萬駐扼要之地，為兩湖江右防勦之師。以五萬合水師為東征江浙之師。計十三萬人，月需餉銀七十餘萬兩，以五省所入多寡均計，每省約出銀十餘萬兩，已餉足兵增。較之此日，各省月支不及其半，是增兵益餉而民力反舒。度支乃裕。蓋各省所入，類皆養無用之兵，賊至不能戰守，又另調能戰守之兵勇為之，是用一兵而糜兩三兵之餉，況又有耗散於無形之地，不可究詰之鄉者乎。此餉之所以不足也。今若合而為一，則不見不足，乃見有餘。然非其人不能為，必五省督撫皆得人，各為整頓自強之計，而又和衷共濟，合力同心，盡除畛域爾我之見，而後可相與有成。昔在江忠烈幕中；曾為籌此策。草疏上陳，雖未能行，而水師之成，實基於此。亦未為無益也。其時楚督為吳撫為崇，西撫為陳，水炭水火，宜其不能相合。今則楚中督撫已可合矣。又加以新放之李（續宜）與毛（鴻賓），是五省已可合其三，若更合兩省，則兩湖江右為之。宮保甚以為然。有目前舍此更無他法之斷。惟未便自陳，必局外人言之方為有濟。因稿書江蘇督辦團練之龐寶生（龐鍾麟）侍郎，及京師同鄉諸友，屬其疏達，未知能否上聞。」又同前書，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張曜孫致王子壽：「下游之師，已過漕運口，距和州百餘里，距白下不足三百里。乃以餉紮兵單，頓而不進。賊悉聚浙中，寧紹並皆失守，杭州屬邑盡亡，孤立一省城，無食無援，何以自立。轉瞬全浙淪亡，與江蘇粘成一片，賊於歲內布置浙中，明年必大驅臺紹山民，分路肆犯。一渡江北略淮揚，一溯源上犯皖楚，其勢必較今年為兇悍。蓋今年所驅脅者皆蘇常之民，孱弱無用。若臺紹山民，則剽悍更在楚勇之上，以之為兵，未必得力，驅之作賊，實屬強梁也。鄙議合力平吳，機不可失，惜胡宮保已去（亡故）。無主持其事之人。都中以朝局變更，遲遲有待，尚未陳奏。邇來奸佞已去，不知曾否有人入告，然疊奉月中廷寄，則似深以苗事為憂，不復題江浙一語。是輕重緩急，殊未精審。苗逆並無技能，所驅脅之民圩，不過歛錢聚衆，恣睢一方。非有遠略者也。自知無能為役，故憑髮逆以假其凶燄，其獻策欲謀北犯，蓋使鶴蚌相爭，坐享漁人之利耳。非眞能為者也。窃料上游未動，髮逆鑒於前事，斷不敢輕舉北伐。故上游有東征之舉，髮逆必無北犯之謀。髮逆衰而苗不雄而自槁，苟能速定東征之議，不特江浙可平，東南可固，西北亦勦撫均宜。非然者，苗逆未平，髮逆得乘虛肆犯，則江楚皖南北同時騷動。苗捻反得肆其蠭臂。我師備多力分，疲於奔命，將何所措手哉。竊謂東征之成否，係東南之得失，即關天下之安危。不識閣下以為何如也。目前接龐寶生（龐鍾麟）閣學覆書並疏稿。書生懵懂，於兵事絲毫不解。竟不以鄙議為然，但催曾制府下行，而不採鄙議一語。不禁憤懣欲絕。因復與一書，明知無益，聊以告鄉人，破此鬱結。稿並抄附，閣下覽之，當亦慨江蘇無人，宜禍亂之莫解也。」

湘軍領袖，面對江南戰局，雖知大有可爲，而所得者乃糜爛殘破之局。須待經營規復。而力薄任重，尤須慎重將事，以免蹈前人復轍。胡林翼識力宏遠，胸懷恢廓，並爲運籌主謀，其所設計，主張湘人一力主兵；吏事則網羅各地英才，並出奏陳，保薦賢能。後日發展，果如胡氏所謀。^⑬且在二年之間，所保人才，沈葆楨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李續宜分任江西、浙江、江蘇、安徽四省巡撫，江南戰局運用，達於統一體系。較之先此五省合防之議尤爲得力。自國藩受任督師，五年而規復江南，僅親統之湘軍已達十二萬人，固使湘軍獲重大發展，尤使江南士民稱頌不置。比較綠營重兵之江南大營，益足見出成功意義。^⑭

五、結論

近世論湘軍史者，見湘軍之發展成功，湘系人物聯翩興起，分任地方督撫提鎮。人才遍布全國。只知其恢張鼎盛，而忽略其坎坷顛躉之經歷。種種印象，形成論點，輾轉傳布，遽成定說。研治歷史，欲求其意義，得其教訓。則須探明各自形成因素背景，發展關鍵，用以爲治世施政之參考。研究湘軍史志，宗旨自宜在此。實則王闔運著湘軍志，原始立意即着重於治亂興衰大節，亦即後人所當取法取戒之參考資鑑。^⑮故其成書，言簡意赅，識斷深遠有力。雖然疏略不詳，卻極具參考價值。

就立足根本而論湘軍，創始領袖之志節最爲重要。湘系創於讀書士子之手，已

⑬ 胡文忠公遺集，卷七十三，第六頁，致曾國荃：「滁文當羅糊高張，取天下之英才而盡羅致之。兵則暫時必應以楚人爲倡，爲綱領耳。」

⑭ 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，第二冊，第三六四頁，患難一家言，卷下：「先是庚申金陵大營陷，蘇，常糜爛，松、灘亦瀕於亡，杭州再失守，江浙郡縣半就淪沒。其時吳中官紳一再疏請曾文正公提全師來援。公堅持先清上游之議，朝廷以衆議敦促之。公奏言必上游肅清，後路無牽制之虞，然後可圖東征，若凌躉無序，不特蘇浙難克，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蹙之慮。文宗聽之。而羣議沸騰，詬厲滋甚。公獨堅定不搖，排衆議，獨行己志。至十一年八月，曾宮保國荃克安慶，始經營東征。同治元年五月，始圍金陵，其布置似若迂緩，然成功亦卒以此。」

又同前書，第三六二至三六三頁，患難一家言，卷下，「是時江南大營威聞天下，假令賊不回竄，我軍何至再陷，即賊兵麇集，而我師餽餉不乖時，賊雖悍敢抗我乎，竊嘗計江南大營，順兵堅城，每戰輒捷，驅之四換，所至克復。東南攻勦之苦，以金陵爲最，血戰七八年，長圍甫合，士卒方冀掃穴擒渠，各邀厚賞。乃復議減餉，以俟成功補給。此適以灰戰士之心，而解勤兵之體。宜其大敵至前，諸軍潰散也。故余嘗謂豪傑之成敗，兵家之勝負，時爲之也。天爲之也。假令湘淮諸公當咸豐間，如向、張二公駐軍金陵。賊十道並進來攻，未知即潰與否，其拙誠堅忍終必過之。其他度亦無甚奇策，不過倡大義，激士卒，近援旁郡，遠援鄰省而已。假令向，張二公據上游，有湘，淮諸公之位，其收功遲速，未知何如，度亦必取建瓴之勢，順流東下，即令非據上游，亦無湘、淮諸公之位，至同治間上游漸次肅清，賊勢日蹙，竊料亦必能克復金陵。然天方以大功授之湘，淮諸公，彼向，張二公又烏往不潰敗決裂哉！」

⑮ 王闔運：湘綺樓書牘（大達書局本），第一一五頁，致劉坤一：「軍志（湘軍志）近始創稿，大約多抄可成。其意不在表戰功，而在敍治亂得失之所由，節下鴻壽所及，雖未施行者，不妨相示，非欲聞斬級禽渠之功也。」

於前論中可見。蓋初起將帥，多爲知書儒生。以文人而擔當武事，已充分表現勇任精神。正爲儒士道德之實踐。蓋保鄉衛民，表率衆庶，均爲儒士天然職責，在艱危之際，只有挺然而出，一力擔當，而不憚其原非所習，固不免於冒險，而並無所畏懼，此亦可見儒士修養品詣之表達。此即湘系領袖個人所具之原始本質。

至就湘系分子彼此間之結合基礎而言，則建立於共同自覺性之使命與責任，彼此深信必須努力團結，始能承擔時代重任。此一認識亦來自儒學士子入世熱腸之表現。

湘系領袖之另一結合基礎，即爲彼此師友交誼關係，爲對時局之共同承擔，而彼此汲引，並互相提携，擔當艱鉅，維護湘人聲譽。至於外在政治軍事上之排擠與傾軋，亦足使湘系領袖更加團結，共知利害一致，力求掙扎奮鬥，以免於一蹶不振。

湘軍初起湖南鄉曲，人數本少，局面本小。朝廷一依正規經制軍之綠營，原屬正常調度。江南大營前後與太平軍相持八年，實爲全國重兵所在，亦爲全面戰局重心，實亦國家經制軍之代表。若非一潰再潰，湘軍雖壯，亦難取代江南大營地位。湘軍無論如何能戰，終亦不過一隅之偏師，朝廷豈至畀以全面使任。即湘軍核心領袖，亦從未敢有此夢想。不惟如此，湘軍領袖尚須千方百計設法避免當權將帥之節制。由胡林翼致京中大僚左副都御史錢寶青函，可以見出湘軍地位之可憐與維繫之不易，其時已在咸豐九年八月，其意識深婉，足以透視清代政壇種種微妙關係，略舉之以爲佐證：

「且弟等不假兵符，不求專對，所求者於事有濟耳。且不貪金陵之功，只期皖北之安慶、廬州、巢縣、與蕪湖得手。則駐軍二百里之外，而金陵不攻自破，了卻江表一事，便可小作結束，爲山水雲霞之人，無他求也。天心久欲鄂人東下，前奏讓賢，乃先天而天不違也。有三事，歸朝之日可請質於聖人者：一、勝帥（勝保）難任事，其人本不知兵，尤不曉事，徒亂人意耳。自降於賊，而美其名曰賊降，益其一生本領，以熊文燦爲祖師，而昏懦剛愎又過之矣。尤乞楚軍不受彼節制，則楚軍或可成功。一、乞部臣堅意主持，嚴催秦晉蜀三省，月助滌公專餉各三萬兩，則滌功可成，鄂力可紓。一、楚軍征皖，不須另假兵符，揆帥寬仁敦大，近時所獨出，實可遙總兵事，不致我軍掣肘。若易以他人，則不能如此之脗合無間也。又林翼精力已頽，夏令輒不寐，前此舉賢自代，其人誠摯專一，必能盡心力於吏事餉事。初八日出奏，十五日奉殊批，另

有旨，又準咨開，奉旨將原摺暫存本處。澹村（羅遵殿）八月初三日入對，計近日恩命已在途矣。九月澹村到鄂，即可及時進院。或疑辭鄂得皖，以皖之翁現與蔣壩之勝相構也。殊不知鄂可辭，則皖亦可辭，使不辭鄂，則皖乃益不可辭。前摺明羅某治兵尚非所長，則欲以免夜郎之行也。欲救己罪，則誤於遲，或可稍救良友，使之盡力鄂事，駕輕就熟，以補軍餉之萬一乎。」^⑥

咸豐十年以前，朝廷對於湘軍領袖責望甚切，而畀賦甚吝，升賞甚稀，獎恤亦薄。蓋對勇營仍存輕視之心，直至江南大營兵潰，無能之將或殉或逃，已難再有可恃將帥爲之恢復全局，由是而湘軍始被重用，湘系始獲真正發展機會。

湘軍領袖之堅苦奮鬥，朝廷既不加重視，而各地大吏更是鄙夷輕藐，多方與之爲難。此種政治環境，殆爲清代朝政黨羣常態，實是齷齪不堪，足以折磨英雄，顛倒賢豪。不同體系，難免齷齪橫生。曾胡每嚴加評論，然亦無術突破。必至江南大營土崩瓦解，曾胡始有展露才能之日。故於此須言湘軍軍系發展，蓋實非單純湘軍建軍立功問題，而爲朝政黨羣之傾軋。當在於地方軍權政柄之全面變化。湘軍乃其核心，湘軍軍系則須擴張至蘇浙皖贛四省督撫實權，甚至並使兩湖閩粵疆吏亦成同系主政，由是而朝政黨羣減少內爭，規復之望始有把握。然湘系固結朝政黨羣，決非顯著組織，亦非完全統一，而僅在於意氣相投，志識相近而已。進戰之際，彼此猶有磨擦，事後承平，則只存彼此呼應而已。近世論督撫權盛，地方坐大，或漫指爲軍閥先河，或歸爲地域分權主義，皆不符於實情。蓋實權仍在朝廷，毫無一人據地自雄。地方之主，前後不同，只在朝政黨羣之代換，完全未越清代政情軌轍。當世史家劉廣京論辨至審，自可接受其鄉土主義一說。^⑦而湘軍軍系意義，實可擴大至湖南鄉土之外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五日寫於香港沙田

⑥ 胡林翼：胡文忠公遺集，卷六五，第十四至十五頁

⑦ 劉廣京：「晚清督撫集力問題商榷」，清華學報，新十卷二期。臺北，民國六十三年刊